

黃道婆和上海棉纺织业

-429
49

黃道婆和上海棉紡織業

張家駒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59年

黃道婆和上海棉紡織業

張家駒 著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 錦興路 54 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1 號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1/32 印張 1 1/2 字數 27,000

1959 年 9 月第 1 版

195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2,000

統一書號：11074·262

定 價：(八) 0.14 元

封面設計：任 意

目 录

一	一个动乱的时代.....	1
二	黄道婆流落在崖州.....	7
三	棉紡織工具和技术的革新.....	15
四	上海“衣被天下”.....	26
五	后人对黄道婆的尊敬和紀念.....	33
六	結語.....	39
附	参考書目.....	42
后	記.....	44

一 一个动乱的时代

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紡織家，她的主要活动年代，約在公元十三世紀末期，即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初期。

她的生卒年月，已經无从确知。不过在她去世后不久，她的故乡——上海县烏泥涇鎮（今华涇鎮），盛傳着有关于她的故事。从这些故事里面，我們知道黄道婆年輕时候曾經流落崖州（今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崖县），大約到1295—1296年的元貞年間，因为她怀念家乡，这才乘坐海船归来，回到烏泥涇居住。从王逢“道婆异流輩，不肯崖州老”^①的詩句看来，道婆从崖州回来时，总在五十岁左右，那末她出生的年份可能是在1245年前后，就是南宋理宗統治期間的淳祐五年光景。

無論如何，她的青少年生活，是在南宋王朝已經腐朽不堪，快要走向灭亡的时代渡过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这样，当她出生的时候，南宋在理宗統治下已有二十多年。南宋在这个时期，国势一天一天地衰落，蒙古大汗侵略的暗影，籠罩着淮河以南的半壁河山。蒙古帝国在西方的远征

① 梧溪集，卷3，黄道婆祠。

軍，正在不斷地擴大戰果，大約在黃道婆出生以後，他們就征服了伊朗。蒙古軍又在東方征服了大理（今雲南省），迫降吐蕃（今西藏自治區）和安南（今越南民主共和國），完成侵宋准备工作，開始進一步進攻南宋。1264年，忽必烈汗建都燕京（今北京），改年號為至元；並且仿照中國的傳統，於1271年定國號為大元。

這時南宋小朝廷內部，貴族、官僚生活腐化，一天甚似一天。他們過着文恬武嬉、苟且偷安的日子。最高統治者宋理宗在宦官董宋臣等包圍之下，大興土木，蓋梅堂、芙蓉閣、香蘭亭，窮奢極侈。董宋臣乘機招權納賄，強奪民田，無所不為。人民恨他刺骨，將他比作地獄中的鬼王——“閻羅”。丁大全做右丞相兼樞密使，把持軍政大權，作威作福，和董宋臣表裏為奸。當時閻妃得寵，和丁大全、馬天驥等官僚串通一氣，迫害人民，有人在臨安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朝門外，寫下“閻馬丁當，國勢將亡”八個大字，半是諷刺，半帶抗議。

負捍衛國土職責的軍事將領，不少人早把國家的安危，丟在腦後。趙宋的天下大勢已去，民族危機頻臨在眼前，他們一概不顧，照樣吃喝玩樂。在抵禦蒙古侵略的戰爭中，僥幸獲得小勝，便夸大戰績，騙冒功賞；一旦遇到挫敗，却又多方掩飾，隱瞞真情。丁大全和繼起執政的賈似道，都在大敵當前，用欺上瞞下的手段，來敷衍搪塞。似道當權十七年，特別在度宗（1264—1274年）一朝，事無大小，听凭他為所欲為。面對着外來侵略的威脅，似道是一籌莫展，過一天算一天。襄陽、樊城被元兵圍困，局勢危急，求援的奏報，雪片似飛到朝廷，他一概

置之不理，天天安坐在西湖葛嶺，起亭台樓閣，和侍妾、妓女、尼姑們賭博、斗蟋蟀，宴飲游樂，並沒有因為大敵當前而稍稍停止。

大地主和大商人，同樣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。臨安城里表面上很是繁華，一年四季，夜夜笙歌，遍地游人。元旦是一年第一個佳節，到那一天，家家飲酒作樂，充滿奢侈享樂的氣氛。很快到了元宵燈節，又是一個不可放過的“吉日良辰”，地主富商少不得又要“及時行樂”。據當時人記載，事前臨安城內便已哄動起來，舞隊數十成群，在街道上往來不絕；到了元宵節，更加是燈火輝煌，游人攔街戲耍，通宵不眠。有錢人家生活好過，轉眼又是清明時節，城里城外，又有一番盛會來臨，出遊的車馬，填街塞道；從清早到晚上，只聽見笙歌鼎沸，鼓吹喧天。其他如中秋節日安排家宴，慶祝子女團圓；冬節甚至三天之內，商店停止交易，人們不是飲酒賭博，便是到各處廟宇燒香游玩；還有酒樓、茶坊、瓦子（表演各種技藝的娛樂場所）、勾欄（劇場）、寺觀、園囿，隨時隨地都成為豪門富室遊戲賞玩的場所。他們同樣地將國家民族的危難，遺忘得一干二淨。

和南宋統治階級恰恰相反，廣大的勞動人民被沉重的封建枷鎖束縛着，過着非人的痛苦生活。自從理宗做了皇帝，有二十多年，天災一直沒有間斷過。1240年的一次大旱，江南成了一個慘絕人寰的世界。浙西地區更是赤地千里，到處是餓死的尸骸；僥幸餓不死的，便只有拖男帶女，離開鄉里，到別處逃荒去。這一年，即使號稱“天堂”的臨安，附近一帶也人煙寥落，景象蕭條；其他地方，更是十室九空，流民載道，那就不

用說了。糧食是那麼缺乏，地主富商們黑了良心，還在囤積居奇，不管窮人死活；於是米價波動非常劇烈：起初一石賣三十貫，漸漸上升到一百貫，最高到過三百四十貫。以後雖見回落，但是一石還要賣一百貫。

米價所以波動，固然是由於天旱歉收，但通貨膨脹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宋朝自從渡江以來，紙幣便成為通行的貨幣，流行在東南地區的紙幣叫“會子”。由於軍事、行政開支和皇室費用浩大，財政支絀，朝廷便大量發行紙幣，來加強對人民的掠奪。會子的發行額一再增加，1168—1232年這六十五年間，增加了三十三倍；以後在十三年里面（1233—1246年），竟又翻了一番。可見當時紙幣發行額的增加，達到驚人的程度。

紙幣發行過多，不能盡量兌現；即使兌現，也不能十足；連官府徵稅，也不肯全收紙幣，還是要收一半銅錢。物價上漲得快，官府雖然舉辦平糶，但地主富商大多囤谷不賣，市面只見紙幣不見米。幣值不斷下跌，桑價三百變三千；十八界（屆）會子二百貫，買不了一雙草鞋。當時有人作出一副對聯，描寫社會的蕭條景象說：

人家如破寺，十室九空；

太守若頭陀，兩粥一飯①。

這大約是黃道婆青少年時代的事了。

農民的租稅負擔很重，1234年已經有人承認說，農民和

① 參看彭信威：中國貨幣史，頁325、329、333；張蔭麟：南宋亡國史補，載燕京學報第20期。

商人的賦稅，已經重至无可复加了^①。農民除了兩稅以外，還要負擔額外的“和籴”“和買”。所謂和籴、和買，都是官府對人民的一種巧取豪奪，名義上是官民交易，實際上是用極低的代價甚至無代價地征收農民的谷米布帛。那些有權勢的人家，官府是不敢去觸動的；貧苦的農民，這種負擔是家家都有，年年都有，真是苦不堪言。另一方面，到南宋末年，土地兼并遠較南渡之初劇烈，拿黃道婆出生前后的情況說，江南每年收一百万斛租米的大地主，已經不是個別的了。用當時租額比例折算，一個這樣的地主，就差不多擁有一萬四千三百頃土地。土地迅速向地主手中轉移，意味着有大量農民，從土地上被驅逐出去，他們失卻了土地，貧困不能自存，便只有向更苦的佃農轉化，要么流入城市去當雇工，飽嘗流離失業的痛苦。

1263年，丞相賈似道倡議“買公田”，就是由官府作價收買私人土地，轉充公田然後又分佃給農民承種。這是國家和私人地主之間一場掠奪土地的鬥爭。起先規定抽買超過限額（二百畝）的田；到後來改為派買，凡是占有一塊土地的民戶，都可能成為光顧的對象。官府償付的是會子、銀及度牒（僧道取得法律地位的憑証）、告身（官員的任命狀）等廢紙。這裡所說的銀，也不過是似道為着收買公田才印發的金銀現錢關子（另一種紙幣），並非真正白銀。紙幣的價值下跌，買公田等於變相的沒收。

① 端平元年劉克庄奏：“前世或稅于農，或權于商，今稅權俱重，不可复加。”見后村先生大全集，卷51。

从表面看来，賈似道收买公田，似乎只有地主和自耕农身受其害；事实上在那些土地上耕种的佃户，也受害不浅。佃户平时所过生活，已经万分困苦，地主役使他们如同牛马一般。一旦土地主人更易，地主即可任意撤田。即使田不易主，遇到别人肯多纳佃租，地主便驱逐旧客，代以新客，这叫做“添租割佃”。这种风气不但出现在私田，而且同样出现在官田上面^①。佃客们离开土地稍迟一些，地主便派遣爪牙，横加凌辱，甚至拆仓毁屋，强迫离去，丝毫不予留情。何况公田收买时随租立价，租多可以贵卖，外加官吏计租定赏，冒功食奖的官吏，虚报租额的情况，也就十分严重。原来不过纳租六、七斗的，现在当作一石入賬。到收租时不足之数，据说是責成原主补偿，其实毫无例外地都要轉嫁在佃户的头上。官府说得冠冕堂皇，声称减免二成租额，但是执行起来，恐怕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。而且南宋时公私田租繳納，輕重不同，这是当时所公認的。一般是私租额重而“納輕”，公租“額輕”而納重；因为官田除額租以外，官吏更多端勒索，浮收“斛面”。由私田变成公田，即使没有“添租割佃”，对佃农也是不利的。

总的說来，黃道婆出生的年代，正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，陷入蒙古統治者奴役威胁，以及汉族地主阶级严重压迫的多灾多难的时代。但是，勤劳坚忍的祖国人民，并没有因此而气

① 李心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，卷147：“詔諸路常平司見賣官田，并令佃人增租三分，如不愿增者，許人割佃。后詔轉運司、提刑司，官田亦如之。”

餒，他們在艱苦的歲月里，一面積極參加保衛鄉土的鬥爭，一面展開對階級敵人的反抗；與此同時，他們還發揮了無比的智慧和創造力，堅持生產鬥爭，為祖國創造出大量財富，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戰線上，作出偉大的貢獻。

二 黃道婆流落在崖州

黃道婆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，文獻上沒有記載。從我們知道的历史資料看來，她少時便孤苦伶仃，一生依靠勞動渡日，死後沒有留下什麼財產，靠着鄉親們埋葬。這樣，她應該出身於貧苦農民的家庭，很可能因為遇到一場災荒，被迫得一家人骨肉離散。傳說她幼年生活貧窮，曾經做過童養媳，這是很可能的。

正如大家所知道的，黃道婆年輕時流落在崖州，直到年老才乘坐海船歸來。假定她在十八歲那年離開烏泥涇，到五十五左右返回家鄉，那末她逗留在海南島的時間，約莫三十多年，占去她一生歷程的一半。這一段時間，對於她的事業講來，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。

為什麼她會飄泊到幾千里外的海南島去呢？這有社會的原因，可能也有家庭的原因。

我們可以推算出，黃道婆長大成人的年代，也正是賈似道推行公田法最嚴酷的年代。公田法的推行，以浙西作為根據地。黃道婆的故鄉烏泥涇，南宋時是秀州華亭縣屬下的一個

鎮，烏泥涇水道从这里自西而东，流入黃浦，当时它是一个頗为繁盛的市鎮。那时候的上海，也象烏泥涇那样，不过是属于华亭县的一个鎮罢了。1292年元朝升上海鎮做县，烏泥涇便从华亭划归上海县管辖，属江浙行省的松江府。这个地区，在南宋时属于两浙西路，正是統治集团瘋狂搜括財富的重点地区。有人指出，自从宋朝南渡以后，两浙地区的賦稅全是橫征暴斂^①。因此当地人民，比其他地方的人民生活更加困苦。这次大規模掠夺土地，恰恰也落在这个地区人民的头上。有人揭露当时統治集团的罪行說：

自从实行强买民田政策，給浙西带来无穷的灾害，从此看不到丰年，两浙人民更加贫困了^②。

人民在故乡不能生活下去，被迫抛家失业，飄泊到天涯海角，找寻一个糊口活命的所在。黃道婆应当就是这許多人里面的一个。

黃道婆之所以流落崖州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流行在华涇鎮一帶的傳說，說具有勇敢坚决性格的黃道婆，当了童养媳之后，受到封建家庭的虐待，但是她沒有向封建势力低头，毅然离开了故乡。我們无法确証这种傳說的真实程度，不过它所說的那种情况，在当时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着的。和黃道婆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戏曲大师关汉卿，在他的杰作竇娥冤一剧中，即曾写出剧中主人公竇娥的身世，就是一个童养媳。她的

① 見潘永因：宋稗类鈔，卷36。

② 周密：齐东野語，卷17。

父亲竇天章家貧如洗，向地主階級蔡婆借了五兩銀子，受高利貸盤剝，合本利該銀十兩，無法償還，只得將七歲的亲生女兒，送給蔡婆做兒媳婦。說是做童養媳，實際上是當作奴婢使喚，經常挨打受罵；在嚴酷的封建家長制面前，婦女是不被當作人來看待的。

至今當地人民還流傳這樣一個故事：有一次，黃道婆在田野勞動了一天，晚上回家覺得很疲倦，就和衣而睡了。她的公婆看見後，不問情由咒罵了半天，黃道婆回了幾句，於是公婆就把她拖下床來，橫蠻地毒打一頓，她的丈夫不但不加劝阻，反而幫着打她，還把她關鎖在一間柴房裡。這時，她覺得不能再這樣的家庭生活下去了，半夜裡狠命地在茅草屋上挖了一個洞，逃走出來，奔到一條停靠在黃浦江邊的航行閩廣的海船上，躲在倉底裡。第二天這條船起碇出海，這才從倉底裡鑽出來，向船主傾吐了她的痛苦遭遇，懇求把她帶到遠方去生活，這樣她就到了崖州①。這一些具體情節，雖然未必和當時歷史事實完全相符；但是說黃道婆這次遠行，帶有反抗封建家庭的成分，並不是一件絕不可信的事。

黃道婆從海路前往崖州，可以肯定是事實。上海這個地方，北宋時早已發展成為一個小型商港；南宋對外貿易更加發達，停靠在這裡的商船增加，海道交通也很方便。從上海航行到崖州，如果坐的是本國商船，習慣上先到福建的泉州，由泉

① 本段敘述據延培：我國古代杰出的紡織家黃道婆，載旅行家 1958 年第 3 期。

州再乘商船到琼州(今广东省琼山县),然后渡海抵达崖州。琼州和对岸徐聞(在今广东省徐聞县南),也有經常往来的航綫。如果坐的是外国商船,可能就要經過泉州和占城(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)。崖州南对占城,只有一水之隔,据赵汝适諸蕃志說:“天水一色,船舶来往,只有靠指南針引路”,似乎也有直接航路。今烏泥涇人民,也有黃道婆先到越南一說,从地理位置和古航路看来,黃道婆恳求到一个好心腸的商人,附搭他的商船去到占城,再从占城渡海到崖州,这也完全是可能的。

至于黃道婆为什么选择崖州做居留地呢?我們認為这并不是出于偶然,而是和江南棉紡織业的兴起,有密切关系的。十三世紀的前半期,棉花的种植从閩广傳入长江流域。在上海附近一带,首先傳入烏泥涇; 烏泥涇首先种植的地方,是名叫八千亩的一块土地(見图1,在今沪閩公路三号桥兩側)。棉种一經傳入烏泥涇,很快就被人們認識到,棉織品具有适合广大人民群众消費的优越特性。根据封建社会男耕女織的傳統,黃道婆在青少年时代,应当已經掌握紡織技术。不过当时烏泥涇的棉紡織技术,却是很落后的。一个具有理想和坚强意志的青年人,最容易接受新鮮事物,因此她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居住,学习先进生产技术,借以解决个人的生活,忘却过去的痛苦經歷。黃道婆所以寄居崖州,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棉紡織业这种新兴事业的刺激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背景,有必要将我国植棉事业发展的历史,简单追溯一下:



图1 八千亩遗址

棉花从印度傳入我国，經過南、北两条道路：

(1) 南路 經過南洋的国家，傳入現在的云南。約在公元一至二世紀之間，即历史上的东汉时代，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人，已經生产出一种名叫“白叠花布”的紡織品，这是我国植棉織布的最早紀錄^①。

(2) 北路 經過西域的国家，傳入現在的新疆。約在公元五至六世紀，即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，在今吐魯番东南哈喇和卓一带建国的高昌，已經采用一种名叫“白叠子”的植物來織

① 見后汉書，卷116，西南夷傳。

布，所織的布很軟白，在市場上当作商品交換，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^①。

上海地区的植棉业，是由南路逐漸北傳的。在未傳播到江南以前，棉花的种植，盛行于福建和两广一带。三国时代的著作中，已經提到福建人把棉花叫做“吉貝”，那末他們最初曉得植棉，应当还要早些。到十一世紀亦即北宋以后，閩广地区种植棉花漸盛。从閩广地区傳到江南，大約在黃道婆出生时的南宋末年。到十三世紀中期以后，即宋末元初，才普遍推广到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南等地。同时在这个世紀的后期，北路植棉区域，也扩大到陝西^②。上海的植棉事业，就是傳到江南那个时期开始的。

黃道婆居留了三十年的海南島，是当时两广地区棉紡織业的中心。海南島的棉織业，在十二世紀后期，南宋人已經有了記載。例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，曾記海南黎峒的少数民族，創造出一套包括捍（去籽）、紡、織的生产工具，对棉紡織业的生产，起了推动作用。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，記載那里的黎族同胞，能够从絲織物中拆取色絲，和棉紗間杂着織成“黎幕”。而方勺的泊宅編，又記有一种織着細字、杂有花卉的“白氎布”。这些記載，說明当时海南島的黎族，已經有了織花机，而且織花的技术很工巧。赵汝适的諸蕃志，更指出十二、三世紀之交，崖州黎族妇女，并不种桑、养蚕，而全部以棉紡織为

① 見梁書，卷54，高昌傳。

② 見元史，卷15，世祖紀，至元26年；農桑輯要，卷2。

业。海南著名的产品，如“黎幕”“黎单”“黎飾”“鞍搭”“花被”“縵布”之类，都是泉州商人运銷内地的对象。

黄道婆居住在崖州期間，和黎族姊妹們結下深厚的友誼，虛心向她們学习技术。沒有多久，她就成为一个棉紡織能手，熟練地掌握了各种先进生产工具。

在这期間，中国起了一个天崩地裂的大变化，1276年元兵攻破临安，南宋小朝廷終于复灭。黄道婆的故乡秀州，沒有经过战争，也落到元軍手里。征服者在这一带进行劫掠，城乡一片蕭条。幸亏劳动人民在困苦环境中，不屈地坚持奋斗，不讓生产停頓。加上有五、六年光景，年成倒还过得去，这才不致十分狼狽。蒙古封建貴族和軍人，却又掠卖江南子女作奴婢，北方到处設有“人市”，叫奴婢高高坐着，听候买主选择，奴隶貿易一时很旺盛。江南人民被迫淪为蒙古貴族的奴婢的，不計其数①。

蒙古皇室、貴族、僧侶，进入中原和南方以后，将最好的土地，用霸占强搶的方式，轉移入自己手里。汉族大地主也勾結蒙古官吏，欺压人民。当时大的商业控制在色目人（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）手中，他們替蒙古貴族經營产业，放高利貸印子錢，叫做“羊羔儿息”。南方人民被压榨得苦了，很早便有群众起来进行武装反抗，但因統治力量这时还很强大，起义群众又缺乏統一組織和正确領導，所以先后宣告失敗。

这时黄道婆一直住在崖州，距离元朝强固的統治基地較

① 見郑思肖：心史，卷下，大义略叙。